

清史论集

庆贺王鍾翰教授九十华诞

朱诚如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清史论集

庆贺王鍾翰教授九十华诞

朱诚如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200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朱诚如主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8
ISBN 7-80047-429-1

I. 清… II. 朱…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0231 号

责任编辑 于庆祥
特约编辑 赵令志
装帧设计 郑志标

清史论集

——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

朱诚如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16 字数 1200 千字 印张 46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00 册

ISBN 7-80047-429-1/K.197

定价: 120.00 元



王锺翰小传

王锺翰，以字行，1913年8月2日生，湖南东安县人。1934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1940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部。从30年代起，从邓文如（之城）、洪煨莲（业）、顾颉刚、张孟劬（尔田）、陈寅恪诸大师游。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二年，归国后，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副主任。1952年秋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大学）教授，现任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北京市史学会顾问等。

合著有：《满族简史》（通卷之一）、《满族史研究集》（主编）、《中国民族史》（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专著有：《清史稿说略》、《清史稿列传校注》、《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清史补考》、《王锺翰学述》、《清心集》等。发表论文数十百篇，其中有多篇被译成英、德、意、日等文，刊于《清史问题》、《当代满洲》、《东亚史研究》等杂志。1991年国务院颁发给有突出贡献给予特别贡献证书，1992年日本满州学协会授予个人著作成果优秀奖，1995年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奖等，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术优秀奖，同年获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多年来，常被邀请赴美、日、意、法等国家与香港、台湾等地区讲学或访问。

序 言

朱诚如

王锺翰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清史、满族史专家。自 1937 年发表《辨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一文开始，先生学术生涯迄今已有 66 年。先生青年时代，得到邓之诚、洪煊莲、陈寅恪、顾颉刚等多位史学大师悉心教诲、启迪，继承五四以来的优秀治学传统，毅然以弘扬民族学术文化为己任，立志专攻清史。虽历经曲折坎坷，始终坚持不渝，不改初衷，将全部的精力、心血皆奉献于学术研究事业，先后共发表论文凡百数十篇，并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四种论文集行世。此外，还担任《满族简史》定稿通纂；主编《中国民族史》、《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经先生整理点校的清史、满族史典籍达上千万字。先生的德、才、学、识广为士林所重，其学术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先生祖籍湖南东安，为家中季子。因受双亲垂爱，终日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故而发蒙较迟。十龄始就傅，从乡里塾师读经；后考入省会长沙雅礼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因聪慧好学，成绩优异，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适值燕大蒸蒸日上，与北大、清华鼎足而三。历史系师生合计不过二三十人，而知名教授竟有五六位之多，洪煊莲、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皆传道授业，先生真是如鱼得水。洪煊莲师当时曾提出“把汉学中心抢回中国”之口号，不啻一枚重石，在先生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自此之后，先生开始自觉地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日本学界之所以敢自命为汉学中心，根本依据就在于其当时自诩在满族史研究领域领先于中国。而日人研究满族史，目的就是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沦为日本的附庸。无论是从学术而言，还是就当时形势而论，要争汉学中心，满族史、清史当位居前沿。先生的选择理所当然地得到洪、邓两位师长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

先生尝云，燕园诸师虽学问各有专精，趣旨亦彼此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具深沉的忧患意识，并将其融入学术研究。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先生正是在他们的感召下开始清史学习与研究的。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再无动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各大学纷纷南迁，但美日尚未宣战，燕园成为孤岛。故都四郊多垒，日人岗哨密布，一时黑云压城。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硕士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撰写的。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人占领燕大，逮捕了司徒校长和洪、邓诸师。其后一两年中，先生风尘仆仆奔走于平津之间，求职谋生，尽全力资助、照顾邓、洪二师家眷；俟二师出狱后一年，先生即间关南下，执教于成都燕大，直至日寇投降。其间，先生受校方委托照顾陈寅恪

师一家生活，得以亲聆教诲，受益多多。先生平生只写过两篇与清史、满族史无关的专题论文，其一为《三国志裴注考证》，另一为《游仙窟著者考》，即受陈师影响撰写而成。

1946年，先生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深造。行前，先生曾征询陈师意见，陈师云，清史研究还是应以中国为基地，去哈佛最好多学些外语。故先生在哈佛近两年中，所选课程大多为语言，如拉丁、满语、蒙语、德语、法语等，皆欲通晓，专业却未曾十分留心。翌年，先生拟定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战争为学期论文，不料指导教师认为太偏重考据，暗示先生这样做论文将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就此中止。这对先生不啻晴天霹雳。按规定，燕京大学每四年向哈佛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先生之前有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皆是四年为期并皆获博士学位以归，这种中止进修的情况以前从未发生。正在哈佛休假的洪煊莲老师得知此讯，曾尽力从中斡旋，亦未见效。哈佛方面究竟为何在先生身上中止奖学金，无从猜测，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令先生无法接受，引为奇耻大辱。负气之下，先生决定提前回国。启程前两个月，先生以英文撰写《游仙窟著者考》一文，随后发表在当年的《哈佛亚洲学报》上，以此为对哈佛方面轻视中国传统考据之回敬。《游仙窟》本为唐人小说，日本学者考证著者为张鹭，先生以大量考据认为是唐代一部俚俗的口头文学写本，断不会出自大文学家张鹭之手。先生欲以此笔墨之争回敬某些美国汉学家，此辈既将中国传统考据方法弃之若敝屣，却将日人之所谓“考据”奉为圭臬。如此不甚了了，只能是以讹传讹。中国人做学问断不可按美国学者规定的模式亦步亦趋，并就此下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之决心。

回国之后，先生用文言撰就《清世宗夺嫡考实》及其姊妹篇《胤禛西征纪实》，以思辨缜密，史料宏富，行文流畅，考证精详，将雍正继位一案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并在清史研究领域一鸣惊人。文章寄到美国，洪煊莲师读后，拍案叫绝。洪师逝世前，美国的华裔学者问其所最激赏的弟子为谁，洪师点出四名，先生之名即列其中。

新中国建立后，于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先生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当时民院历史系人才济济，元史专家翁独健、辽史专家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等皆在其中。由于先生治清史著名，故负责研究满族史。此前，满族史研究从属于清史，学者多将其视为清朝开国史的一部分，研究重点在于皇族世亲和八旗武功，孟森先生于此有开创之功。满族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先生似有开创之功。

从“正宗”的清史研究转向民族史，不仅意味着史料的扩展，且意味着在史观立场和思想方法上发生深刻变化，必须以全新的民族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为指导。这对于一位习于传统考据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考察学术界，能左右逢源，同时在几个领域作出成就的学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也有不少学者，当客观形势和研究环境迫使他放弃自己擅长的领域而去从事不情愿的探讨时，则往往裹足不前，从此便无所作为，甚至销声匿迹。从学术类型来看，前者往往是通才，而后者多属专家。对于专家而言，“改行”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冒风险。先生在40岁以前，显然属于后者。虽然大学时学习过历朝断代史，也讲授过中国通史和史学史，但自立志为学以来，近20年所潜心专注者，毕竟是清史，所研磨的材料亦多属于清三通、会典、则例、实录之类，而对民族史研究方面涉猎甚少，再重新开拓一片尚不能完全明朗的领域，实需要勇气与毅力。以先生当时的思想，虽不能预料日后能将清史满族史融为一体的境界，但顺应变化，服从大局，是必须作出的选择。

解放后，在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之下，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和对民族关系问题的探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民族工作的深入开展，又给史学家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如何认识少数民族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不仅会丰富和变革中国

历史学的内容，且对于新中国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亦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先生认识到这一点，即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这是先生在思想认识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飞跃。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讨论，自30年代以来已取得极大进展，但这种探讨多局限于汉族社会和中原王朝的历史。而对于广大周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先生是中国老一辈学者中较早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之一。1956年，先生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基本上清理了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发展过程，给予后世学者以很大的影响。先生的治学方法也由单纯的考据上升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1957年，对先生来说是大喜大悲之年。喜者乃先生的第一部论文集《清史杂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收录了先生1948年以来的论文8篇，附录2篇，凡30万言，代表着中国当时的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悲者，乃正当先生学术研究最为旺盛，精力最为充沛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突然降临。同许多正直的学者一样，先生在反右斗争中也未能幸免，被划为“右派”。从此入另册，失去了发表著述的权利。其后，“四清”、“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更何谈什么学术研究！从1957年至1978年获平反前的20余年间，先生无片言只语问世。而20年过去，先生已年逾花甲。一位研究清史的学者谈起此事时，曾感慨地说道：如果不是这20年，王锺翰先生的学术成就当不可限量。

人生坎坷，并未令先生沮丧、消沉。虽不能发表文章，但先生仍在暗中积累资料，进行学术积累与准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先生被调往沈阳，利用业余时间，对清朝的发祥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又遍阅朝鲜《李朝实录》，从中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后收入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书》第七种。70年代，先生借调中华书局，参与《清史稿》点校，随后又应书局之约，独力点校《清史列传》，凡400余万言。仅就上述工作而论，已是莘莘大观。“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学术事业终于熬过漫漫的冬季，迎来了和煦的春光。1978年，先生已是65岁的老人，却依然经冬犹茂，充满活力。从那时起，先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占全部发表的论文数量三分之二以上，也就是说，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在65岁以后写成的。真可谓厚积薄发，收之桑榆。此外，先生还完成了《满族简史》通纂，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并主持《满族史研究集》，主编大型《中国民族史》和《四库禁毁丛刊》等多项工作。

进入90年代，先生老当益壮，新作迭出。先后出版《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三部论文集，凡百万言，其视野几乎覆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足令后学者辄发望尘之叹。而综观先生后期的学术研究，与50年代以前相比，其风格有了明显变化：第一，突出整体宏观概括。把握清史、满族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已不局限于就一人一事作细密的局部考证，即所谓以微而见著，同时也就整体来剖析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力作《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成分问题》、《清代民族宗教政策》、《清代官制简述》，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成果。第二，历史分析的层面也比过去更为丰富，不仅注意政治、经济问题，而且扩展到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诸如《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试析康熙的农本思想》、《康熙与理学》、《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等皆是，力图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来全面把握历史时代的本质与特征。第三，由于上述变化，必然对历史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分析的成分明显增强了。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前引规模宏大的论文中，即使如万余字的论文《略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清政府与台湾郑氏

关系之始末》等，也都是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性质及其转化的力作。在许多论文中，清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人物的地位都得到合理和精当的解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先生在研究中逐渐将满族史与清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路径。先生认为，不懂得满族史，清史上的许多问题未必能得其真相；不懂得清史，满族史的意义也不能完全揭示出来。诸如清初宫廷内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马法”，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即“汗依阿玛”，这些称谓若不懂满族习俗和传统，仅从汉族封建观念来解释，必然失之偏颇。又如雍正即位，也只有从满族历史和入关后所受汉族制度影响两方面考虑，才能合理判断世宗究竟是入承大统还是阴谋夺嫡。另一方面，满族的汉化、封建化问题，若不从汉族封建经济对旗地经济形态的影响来分析，也就如无源之水。在先生的论著中，满族史就是清史，清史也无处不关系到满族史，二者密不可分，相得益彰。今日之清史研究，人才辈出，异军突起，远非当年仅有几位学者登台的冷清场面。先生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膺“泰斗”之誉，熟谙典籍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者，则在于先生治学经历了由清史至满族史，再将二者融为一体的独特途径。

回顾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青年时值外寇入侵，忧史与国之偕亡，毅然立志专攻清史。其后屡经颠仆挫折，却不改初衷，老而弥笃。始终以自己的学术服从国家民族需要，服务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大业，先生的学术成就固然可贵，而这种精神尤为难得。

另一方面，先生也同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在学术上有充分自信。先生的“雍正夺嫡”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反对意见依然存在，这是很正常的。四五十年后，先生根据故宫档案中新发现的康熙遗诏，再次就此深入探讨，更坚定前说，同时公开声明，如果自己的结论经不起时间检验，“翻案”不仅可能，而且是理所当然。清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新史料不断发现，学者的研究结论必须不断准备迎接挑战，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坦荡襟怀。

先生的学术自信还表现在治史方法上。他早年受邓、洪二师影响甚深，对考据有特殊偏好，即使当年在哈佛碰壁，亦未曾放弃这把“金钥匙”。在先生看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否敢于坚持本民族的学术传统，是一个学者有无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不能一提到考据，就认为是乾嘉之故物，是封建文化。其实考据方法具有诸多科学成分。尤其重要者，乃中国史学研究与西方的情况殊不相同。中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庞杂而又缺乏有系统的定量统计的传统。概括而言，中国史学界对史料系统而科学的整理阶段还远未完成。因此，搜集、鉴别、整理资料的任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个人来承担的，此乃他们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且就有些问题而论，根本不可能有系统完整的材料，必须而且惟有运用考据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考据仍是治史的基本方法。有些人轻视这种训练，搬用西方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用以炫惑读者，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先生四部论集皆以“考”命名，即寓意于崇笃实，抑空论，而非以为史学研究止于考据也。考察先生治学的前后变化，中年所写的《清世宗夺嫡考实》，已不同于早年的单纯考据；而晚年的文章，虽无不以考据为基础，但又处处与论析相结合。先生说，时代变了，治学方法也要变。先生早已不拘泥于考证，他谈到自己《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时说过：“若按我以前搞考证的路子，是写不出来的。我是有意识地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问题，也是我长期思考得出的结果。”先生又说，考据本身也在变。如果取以新的观念，对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综合考察辨证，考据这种传统方法同样能放出异彩。先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值得我们深思。谦逊和自信、继承和创新，在先生身上形成了完美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在于对科学的诚实，对学术的热爱，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

古语有云：“仁者寿。”先生数十年来心地坦荡，以德报怨，上下求索，未曾少懈，不觉已进

人九秩之年。我与先生是忘年交，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我毕业于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因此，先生是我的学长；我读研究生时业师张维华（西山）先生与先生是燕大前后期校友，均承师邓之诚、洪煊莲、顾颉刚等史学大师，因此，论师承，我们是一门。论辈分先生是我的师长；我作研究生论文时，张维华先生令我去中关村先生家聆听教诲，先生不厌其烦，悉心指教，于是结下了师生之谊。我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时，曾延请先生莅校讲学。我奉调故宫博物院后，与先生交往更加频繁，先生每有新著，不顾高龄，亲自登门相赠，令我感激不已。我在清史研究中每每遇到难题，亦常向先生请教，师生之谊日厚。我虽未曾位列授业弟子，但受益于先生的不亚于其门生弟子。总之，我与先生交游日广，情谊日笃。值此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学界同人发起出版学术纪念论文集，今付梓在即，先生索序于我。以后学晚辈，既诚惶诚恐，又何敢辞焉，因而不揣冒昧，就我所知，爰抒己见，草成兹篇，故未暇虑及序之不文也。

2003年初春于北京

目 录

清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过程和清廷获胜的原因	何龄修 (1)
吴三桂的叛乱和杨起隆、朱三太子之关系	
——以三藩之乱研究为中心	[日本] 细谷良夫 (15)
有关清代八旗与绿营关系的两个问题	定宜庄 (30)
顺治遗诏与清初政局	姚念慈 (44)
清初福建“大当”之役考略	陈支平 (55)
清前期治藏政策三阶段略论	陈楠 (64)
清朝在东北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浅析	赵令志 (83)
论清朝对后金政权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余梓东 (102)
明清州县的行政权力构成	柏桦 (110)
论刘锦棠对清季新疆的开发	(台湾) 陈旺城 (119)
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	郭松义 (144)
清代官员补缺制度研究	岑大利 (149)
雍正帝严格官员处分定例拾零	张莉 (159)
试论清代钦差大臣对科举舞弊案件的查处	张晶晶 (166)
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	彭陟焱 (171)
清内务府御用手工业的多方面功能	韦庆远 (182)
清前期商船航日贸易与考察	郭蕴静 (192)
清代北京寺观的地产	刘小萌 (206)
清代地方权关考述	祁美琴 (222)
天津开埠与津冀城乡关系的转型	
——一项对 19 世纪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互动考察	徐永志 (229)
点评皇太极	王佩环 (239)
试论多尔衮与朝鲜的几个问题	郑克晟 孙卫国 (247)
洪承畴刘氏夫人考	杨海英 (262)
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	杨珍 (272)

论金简	徐 凯 (285)
“年少争传张二奎”	
——张二奎卒年考略	王政尧 (295)
满族奇人——英敛之研究	侯 杰 秦 方 (300)
《燕京旧闻录》三则	徐苹芳 (309)
《蒙古源流》作者萨冈笔下的唐蕃联姻	[美国] 刘元珠 (315)
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海峡两岸乾嘉学派研究之回顾	陈祖武 (320)
论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哲学意蕴	黄爱平 (327)
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的各种抄本	[日本] 中见立夫 (337)
翁方纲之《四库全书提要稿》	[日本] 泷野邦雄 (348)
蒙古文档案研究	
——有关东土默特部资料译释	达力扎布 (370)
乾隆时代的疆域格局与《内府舆图》	成崇德 孙喆 (379)
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十六咏并图》研究	李德龙 (392)
清代甘肃地区气象水利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402)
从观象台走进《礼器图》	
——清宫西洋科技仪器的命运	刘 潞 (407)
清末民初北京的民风民俗文化	叶志如 (415)
有关沈阳清故宫建筑历史的几个问题	姜相顺 (425)
清前史迹棋盘山点将台略考	关嘉禄 (429)
盛京皇宫宫殿命名再释义	唐英凯 (432)
北京天坛坛壝制度的形成	姚 安 (437)
关于清代佟氏家族的几个问题	佟永功 (446)
从清代档案看旗人的家庭纠纷 (1644—1795)	(台湾) 赖惠敏 (451)
满族入主中原对清朝历史之影响略谈	杜家骥 (471)
论康乾盛世及其一代旗人	滕绍箴 (479)
关于入关后编立的八旗汉军佐领	[日本] 绵贯哲郎 (487)
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	[美国] 盖博坚 (499)
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及特征	赵阿平 (510)
满文“君”、“臣”、“人”类词汇初释	江 桥 (524)
清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法律与民族	
——法令的意义及案件之办理	[美国] 李中清 王湘云 (535)
锡伯编入八旗再考	[日本] 楠木贤道 (547)
十九世纪后半叶鄂伦春人的编旗与布特哈问题	[日本] 加藤直人 (559)
论清代惟一的哈萨克牛录之编设及其意义	[日本] 小沼孝博 (568)

历代达赖喇嘛转世情况初探	陈庆英 (576)
三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顿珠生平述略	喜饶尼玛 (592)
六世班禅朝觐始末	郭美兰 (597)
佛教文化对阿尔泰语系某些民族语言的影响	乌力吉 (608)
高氏高丽、王氏高丽是两个不同的古国古族辨	杨保隆 (612)
刘郁《西使记》校注	尚衍斌 (622)
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学谊	祁庆富 [韩国] 权纯姬 (632)
两位大师与一副对联	
——关于燕京大学的一桩逸事	邸永君 (642)
关于清史编纂的体裁与指导思想及其他	王俊义 (645)
关于史学普及与提高的几个问题	马宝珠 (651)
文名富德高北斗后辈门墙承春风	
——献给鍾翰老师九十诞辰	支运亭 (658)
回忆与盼望	
——寄给鍾翰学长的祝福	洪 範 (660)
蒙古摩诃迦罗崇拜与清朝的起始	
——1638 年《实胜寺碑记》	[德国] 嵇 穆 (664)
从《旧满洲档》和新发现的史料看满文史料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	[意大利] 斯达里 (702)
满汉文《努尔哈赤檄明书》何种文字稿在先	[俄罗斯] 庞晓梅 (709)
附录 王鍾翰教授著作年表	赵令志 (整理) (715)
后记	(723)

清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 斗争过程和清廷获胜的原因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朋友中颇有不治史学而对一些历史问题感兴趣者。或问：清廷治下满族人数很少，为什么能在争夺全国统治权的角逐中获胜？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系统思考，故所答连自己也觉得不甚圆满。现在以此为专题试作一文，回答这个可以从多方面探讨的问题。答案未必及格，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教。

上 斗争过程

清廷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不必追溯久远。努尔哈赤虽在万历末叛明立国，但力量单微，不可能有问鼎中原的想法。皇太极继立，到天聪末仍以“我国起兵之故，非欲取天下得大位”^①为词，显然是实情。到崇德末，清廷差不多掩有全辽，眼见明朝江山岌岌可危，而后萌生取而代之之心，才多少有些现实基础。但皇太极此时还不敢轻言代明而有天下，认为“虽蒙上天眷佑，尽得土地，一统全国，亦难保子孙世代永袭霸业。况昔之金国亦曾统一全国，今见其永存乎”^②？面对弱小落后的实际，这毕竟不是多余的忧虑。在皇太极身上，存在扩大统治对他的诱惑，但还谈不上君临全国的“强烈愿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事实上是导致清廷参与全国统治权角逐的关键。

因此，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从山海关石河之战开始。此战最先只是大顺农民军讨平吴三桂反乱的战争，因清兵参战而发生变化。战争双方，一边是清睿亲王多尔袞所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构成的主力，以明平西伯吴三桂所率关宁铁骑（关、辽两镇兵）、山海关乡绅原明许州同知吕鸣章等所率乡勇为前锋，一边是李自成亲自统率的大顺军将士，但有大量山海关民众与他们站在一起，“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粮之民”^③。清朝正处在建立前夕，满族贵族的对策只有进行镇压，为清朝建立扫清道路。这在此前不久已由两大智囊人物范文程、洪承畴不约而同地加以明确。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说：“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降清原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出：“扫除乱逆，期于灭贼。”^④这都是视农民军为死敌的主张。因此，山海关石河之战惨酷、激烈。清军坐视关辽镇兵、山海关团练对大顺军死战一天多，两败俱伤，然后以逸待劳，入关一战而定。大顺军和民众被屠戮，“二三十里间”“凡杀数万余人”^⑤。尸骸积如丘山。

山海关石河之战的意义在于：其一，大顺失利惨重，直接导致退出京师，返回陕西，清朝建立的结果；其二，阶级分野与民族斗争在此战中结合在一起，构成清初抗清第一战，标志着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过渡，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其三，清廷将充分利用降敌卖命，以弥补满族自身人力的不足，此战对吴三桂、吕鸣章等及其所部的使用，完全体现出既定的方针和相关的政策、策略。

清朝建立后，三种政治、军事力量（李自成大顺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和各地的农民军，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朝政权，汉族士绅陆续拥立的南明政权）的激烈角逐，转化为你死我活的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明朝灭亡前对后金（清）、农民军两面作战，此时开始他们各自内部和相互间动荡、分化、改组的进程，清朝占据主要方面，对农民军、南明作战，促进两个对手间的矛盾朝缓解的方向发展。

农民军作为一种政治、军事力量，除大顺和大西外，北方各地人民随着清军的推进，施行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迅速展开武装反抗。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昌平、三河、天津等近京地方的民众最先组织抗清军。接着京南饶阳康文斗、武强郭壮畿等联合起义，数万人围攻饶阳，牵制清军南下。夏秋间，大顺军王鼎炫等在内黄（今属河南）、清丰、隆平（今河北隆尧）等地，与当地苏自兴等起义军结合，攻城略地。巨鹿刘守分还建元天定，以示坚决反抗。京北宣化一带则有民间宗教结社的反清活动。山东、山西等省原来反明的农民起义，都纷纷转到抗清的轨道上，其中有山东嘉祥满家洞擎天大王宫文彩起义，山东濮州（在今河南范县境）、范县（今属河南）榆园军任七等人起义，山西吕梁山区起义等等。大顺、大西和各地农民军如果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相对于明、清两方来说，可能是首屈一指的。但实际上李自成与张献忠两领袖长期不睦，大顺、大西两军积怨。在满洲铁骑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还互相摩擦。七月，李自成派部将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⑥。“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⑦。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也是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满家洞起义军虽然举起大书永昌年号的旗帜，但并不是李自成指挥的队伍。陕西以外的大顺地方政权和军队，正遭受明清两方的逼迫而败溃，自顾不暇。李自成远在陕西，也鞭长莫及。所以各地农民起义军都不统一，各自独立作战。

明朝被推翻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北方一部分士绅因受农民起义重创，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紧跟吴三桂之后，投入清朝的怀抱。许多在京的和地方的官员如山海关总兵高第、总兵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纷纷降清；或通过举荐，或主动立功等途径出仕，原明大学士谢陞、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就是这样与清朝结合在一起。北方另一部分士绅站在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其中有的人留居北方，有的前此已因躲避农民军南下，有的在清兵入关后南走。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山西平陆人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原明太康知县梁以樟、徐州沛县举人阎尔梅等就是这类坚持民族立场的士绅。南方士绅、包括一部分南逃的北方士绅的反映，更加值得注意。他们不可能甘心让江山落于农民军之手，也不可能甘心让清人渔翁得利。其政治代表人物在悲痛、彷徨之余，群聚南京，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在清朝眼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因为这表现出汉族士民坚决反清的意义。明朝的重建树起了鲜明的政治旗帜，实际上是一面民族斗争的旗帜，一切反清的政治力量最终必然归于这面政治旗帜之下。

清廷非常了解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断依靠督抚按镇、八旗劲旅、投诚明军进行镇压。进至京师之初，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袞即派遣固山额真巴颜、石廷柱、李国翰、刘之源等进征昌平等处义军，投诚总兵孔希贵等进征三河起义军，都统金砺、副都统李率泰进征天津卫起义军。顺治元年

十月十九日，清廷自沈阳迁至京师，立足不及一月，即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军自大同边外进攻榆林、延安，由陕北而南，消灭西安李自成大顺政权。二十五日，清廷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率军南征弘光政权。阿济格等迅速出征，多铎等则在出发前奉命先行“便道往征”李自成，“即追蹶贼后，直趋西安”，与阿济格军南北夹击，“两路大军务期合力攻剿平定贼寇”^⑧。接着，清廷还派出肃亲王豪格率军进征山东嘉祥满家洞起义军。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军破潼关，进占西安。李自成率部弃城南走。多铎也从西安率军南下，转征江南。阿济格则负追击大顺军之责。五月，李自成在湖广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多铎清军征进顺利。四月二十五日，多铎军克扬州，杀害坚守扬州的明督师史可法。五月十四日，南京陷落，弘光政权崩溃，弘光很快被俘。清军在江阴、嘉定、松江、太湖等广大地区遭到顽强抵抗，但江南仍然落入清朝手中。

此时，清军处在全面出击状态。顺治二年夏，贝勒博洛从多铎处分军一半，抚定苏、常后，疾趋浙江杭州，对南明作战。三年（1646年）二月，博洛受命为征南大将军，征浙江、福建。英亲王阿济格追逐南逃的李自成军，也取得湖广、江西一些地区。自成死后，二年十一月，清廷改派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攻取湖广。同月，清廷以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兵四川，对张献忠进行威胁，又“下诏招抚”，要他“审识天时，率众来归”，“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⑨。但何洛会被陕西境内起义军牵制而无法脱身进川，已暴露出清军扩大征进与兵力不足的矛盾，不得不更加注意适当收编，各个击破的方针。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受命为靖远大将军征张献忠大西政权。张献忠大西军困于四川明军的攻扰，准备撤出四川，北返陕西。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在西充与豪格前部遭遇，张献忠中箭牺牲。大西军与大顺军一样，在清军攻击下丧失领袖，这件事不仅对农民军，而且对全国形势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影响。

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阶级矛盾，造成了汉族力量的严重分裂和削弱。清朝很聪明地加以利用，及时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取得很大地盘。但是，这种迅速推进引起两个结果：一面是扩展征进并推行民族奴役措施，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一面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面临共同的威胁，以及推翻明朝统治的两位农民军主要领袖相继去世，使农民军与南明士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冲。于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间做了适应性调整，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联合角逐。顺治二年闰六月，南明官僚继续维护明朝正统，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在福建拥立隆武政权，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张国维、举人张煌言等在浙江拥立鲁王监国政权。两个南明政权分别得到一部分坚决抵抗派官僚的支持。大顺农民军第二代领袖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开始转变战略，实行联明抗清。他们在湖广分别与隆武政权的湖北巡抚堵胤锡、督师何腾蛟接触，接受隆武政权的封赐和节制。鲁王监国政权在钱塘江抗清之役中战败，一溃而不可收拾，于是流亡海上和福建。隆武政权五路北伐收复南京的战略计划，也因与鲁王监国政权内争、隆武政权内部实权派郑芝龙兄弟抵制和破坏而化为泡影^⑩。这个政权的坚决抗清派官员大学士黄道周、朱继祚等以及隆武帝后都先后就义。顺治三年冬，兵部侍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广东肇庆拥建永历政权。大顺农民军余部继续拥护南明朝廷。大西农民军余部进军贵州、云南，也主动与永历政权接触而走上联明抗清的道路。福建沿海则有郑芝龙之子郑成功伯挂招讨大将军印郑成功的义师奋起。北方和浙江的斗争没有削弱，而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抗清起义又纷纷爆发并趋于激烈。这就造成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

与战争推进同时，复明运动也日益活跃起来。复明运动是部分明遗民、士绅、民众共同进行

的以恢复明朝统治为目标的地下活动，持续的广泛的自觉串连发动的民族抵抗运动，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潜流。抗清复明斗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的抗清武装起义，一种就是地下复明运动。这是互相联系、渗透、支持、配合的两种斗争形式。公开的抗清武装起义需要有地下活动的协助，以联络人事、搜集情报、制造声势、策反敌方、提供财物和人员支持等等；地下复明运动则以公开起义作为政治旗帜、军事依靠，而且有些复明运动就是公开抗清起义者策动起来的，并加以节制。这是不可分割的明、暗两条战线。复明运动最早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当年进行奔走联络的徐州沛县举人阎尔梅。后来受永历封授伯爵兼管理北直山东事宋谦（李乾），也是在北方广泛从事复明运动的重要人物。已经降清的官僚钱谦益及其妾柳如是也投身复明运动，与海上郑成功、西南永历政权等都有联络。顺治四年（1647年），原明延安府推官顾咸正通海，清苏松常镇提督吴胜兆反正，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复明大案在江南松江（今属上海市）发生。江南江阴（今属江苏）贡生黄毓祺等在江南北更积极活动。连续发动的复明运动，在江浙形成苏松、南京及其附近、杭嘉湖等几个中心。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顺治五年开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表现出由原明降清武将反正促成的特点。农民军新败之余，正进行调整，以恢复元气。明军节节败退，内讧则劲头有余，抗清则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降清原明军反正，扮演了第一次抗清高潮主要发动者的角色。其中有降清原明将领与清政府的矛盾，这是民族矛盾在清朝内部的一种表现。从根本上说，社会上民族矛盾尖锐化，复明运动利用清朝内部矛盾进行策反，促进了降清原明军大规模反正的连续发生。顺治五年正月，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参将王得仁揭起反正之旗。金、王受清江西巡抚章于天等摧辱、婪索，满怀愤慨，阴蓄叛志，“方南顾明微，北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动员他们反正的说客则屡至。镇守赣州的明督师“万元吉尝遣间使说声桓反正”，金声桓幕客黎士庐、幕客南昌诸生胡以宁也下说词，扬州福缘庵僧德宗更因金声桓“礼信”，“每劝其改图”，“声桓之复归明，德宗启之也。”新建诸生殷国桢则“说得仁部下王禹门反正，禹门说得仁，得仁亦心动”^①。金声桓等反正，对抗清复明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月，清辰常沅道戴国士反正，剪发辫、复衣冠。四月，清贵州黎平守将陈友龙反正，攻入湖南。清广东提督李成栋痛感“何起义之多耶？某深受国恩，位列开镇，反不如粤民好义耶”^②？于是在原明大学士何吾驺、黄士俊和家属侍妾张玉乔、养子李元胤推动下，他也举义反正。当金声桓、李成栋在江西、广东作战的时候，北方的反清起义正如火如荼展开。陕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米喇印等起义、山西交城山区农民起义、陕西韩城虞胤韩昭宣起义、山东栖霞于七起义等构成震动清朝朝野的声势。十二月，清大同总兵姜瓖在饱受清廷歧视和申斥后反正，进一步激动反清浪潮。

第一次抗清高潮虽然给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清山西巡抚祝世昌甚至发出惊叹：“呼吸危亡，朝暮难保。”^③但南、北各处反正都被清廷调集兵力，各个击破。第一次抗清高潮也渐渐退落下去。

其后，清朝与抗清力量双方进入一个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发展有：东南沿海郑成功、张煌言抗清武装开始壮大；大西军旧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归附永历政权。这样两种发展，是在清朝倾大力打退第一次抗清高潮后暂时留下的空隙中出现的，必然对以后的斗争发生关键性的影响，并且迅速促成顺治九年（1652年）第二次抗清高潮。

在双方相持阶段中，永历政权与农民军旧部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顺治七年八月，占据贵州、云南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旧部与永历政权直接接触，以求实现联合。十一月，清军袭破广西桂林，明督师瞿式耜等不屈死。年底，在广西联明抗清的大顺军余部李来亨、高必正（一功）等，因受驻守潯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的明庆国公陈邦傅排斥和袭击，被迫脱离永历政

权北上，后来到达川楚交界地方的夔郢山区坚持抗清。八年九月，陈邦傅率浔州文武官降清，永历政权官员降清者络绎，永历处境岌岌可危。九年初，永历被孙可望迎到贵州安隆（改名安龙）。从这时起，永历政权已完全倚大西军旧部为活。

大西军旧部较大顺军旧部统一。大顺军自李自成死后就分裂为不相上下、平行活动的多个部队，虽有联络但无统属。大西军张献忠留下了一个以孙可望为主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的领导核心。这是一种优势，在无形中增加巨大的力量。顺治九年春，清廷将永历政权和大西军旧部作为重点消灭对象。清军自四川、广西两路进攻，大西军与南明两面应敌。七月初，李定国率军疾驰，奇袭桂林，破城，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死，家口被杀，部属受诛，死亡不可胜记。此时入关不足十年，满洲八旗诸王、贝勒、一流战将多尔袞、多铎、豪格、博洛、阿巴泰、勒克德浑、杜度、阿济格等都已经辞世，孔有德之死对清军无疑是一个重创。清廷以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南征贵州，在得知孔有德死讯后受命先征剿广西。八月，李定国回师北伐。十一月，两军相遇于湖广衡州，李定国伏兵蒸水（流经今湖南衡阳县境）两岸，一举击毙尼堪。桂林、衡州大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⑭，形成清初的第二次抗清高潮。它反映出以农民军旧部为主力的特色。

在抗清战争胜利推动下，复明运动日趋活跃。在南京附近，有原榆园军头目平一统、原明太仆寺少卿贺王盛加紧组织伙党，并派人偕钱谦益委派的人一道去贵州与永历政权联系。顺治五年，永历朝荡虏伯杨鹞奉敕到江南存问旧臣余鹞翔等，后在江浙、山东、河南发展党羽，配合张名振北伐。原明尚宝司卿李之椿等以浙江嘉兴、湖州为基地，在更广大地区组织明朝宗藩、官员、士民，“意图内应外合，轰动封疆”^⑮。此外，在江浙从事复明运动的，还有魏耕、吴钜、申自然、费六相公等人。李定国本人进入湖广境内作战时，还在南岳衡山接见地方著名缙绅原明翰林院检讨陶汝鼎、尚书周堪赓、巡抚郭都贤等人，直接推动复明运动的发展。

正当抗清复明形势顺利发展之际，不幸的变化又发生了。秦王孙可望以李定国功大，两人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永历政权内部为这类内讧所累，虽抗清战争获得一些胜利，整个形势仍不能有大的起色。延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孙可望在对李定国的战争中失败，转投清朝，抗清武力因此严重削弱。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下复明大案被清朝相继破获，平一统、贺王盛、余鹞翔、李之椿等都惨遭杀害。

至此，内地的南明和农民军抗清力量已受到清朝许多重创，逐渐衰弱下去。东南沿海以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为代表的义师，利用八旗不擅海战，顺治八年始设水师官员的机会崛起。顺治十、十一年及其后，他们发动过几次北伐和重要的近海作战行动，使清军穷于应付。由此看来，此时期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领导的海师成了抗清主力，并于顺治十六年由他们掀起第三次抗清高潮。

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郑成功、张煌言率水陆大军十余万联合北伐。郑军以破竹之势取得镇江、丹阳等处后，七月，进而围困南京。张煌言统舟师溯江而上，取得芜湖后分军四出，传檄远近，江南北相继投降，凡得4府3州20余县。顺治帝闻讯震恐、盛怒，竟想逃回关外，后来又准备御驾亲征，作最后一搏，不胜则死。但是，这种反应显然过了头，事态对清廷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第三次抗清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来潮快，退潮也快。郑成功轻敌致败，仓皇撤离。张煌言军星散，后被捕牺牲。郑成功则东征台湾，收复台湾后很快病逝。与此同时，永历政权因孙可望降清而机密尽失，在清军进军下瓦解。永历君臣逃往缅甸，后被吴三桂捕杀。李定国等病死。

对清朝统治形成威胁的大规模反清复明斗争都相继平息。剩下来的，康熙初，夔郢山区农民